

读 书



文 丛

## 经济·文化与发展

厉以宁

读 · 书 · 文 · 丛

经济 · 文化与发展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6.11

(读书文丛)

ISBN 7-108-00887-4

I. 经… II. 厉…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445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宁成春

---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39,000 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 册

---

ISBN 7-108-00887-4/F·48 定价 13.50 元

## 前 言

收集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不完全是经济学方面的。其中,有几篇讨论的是经济史与社会发展问题,有几篇涉及了社会文化领域,还有几篇则与我在北京大学的教书生涯与体会有关。当然,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因为这毕竟是我的专业范围。这样,把这本文集称做《经济、文化与发展》,是合适的。

严格地说,经济史研究也属于经济学研究。或者,正如有人所讲过的,一切经济学研究都可以列入经济史研究之中。今日上午发生的事情,到下午就成了历史,而下午发生的事情,到明天上午同样会成历史。尽管我们不可能分得那么细,把一天分为前十二小时和后十二小时,至少,一九八八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所经历的闯价格关的事件,以及随着闯价格关的失败而导致的紧缩,在今天看来,不已成为经济史了吗?的确,经济学研究与经

济史研究有时是难以分清的。

文集中所收入的几篇讨论经济史的文章，反映了最近几年来我在这个领域内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评价的那一篇，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通过讨论是会逐渐取得共识的。关于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化一文，较多地从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化过程的一般性问题，它们会给读者以不同的启发。

社会流动、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企业家的忧患意识等课题的研究，其覆盖面远远大于纯经济学的探讨。我一直把“体制、目标、人”视为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对人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因此，上述这些课题虽然是社会、文化领域内的课题，实际上都关系到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即对人的研究。如果说经济学中有许多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最薄弱环节可能就在同对人的研究密切有关的社会、文化领域内。我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引玉之砖。但愿有更多的研究者今后投身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

最后，我还想为收入本文集的几篇与北京大

学生生活有关的文章说几句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和教书已经四十多年了。一九五一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一九五五年毕业，留校任资料员，以后又转为助教，又一步一步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回忆录是要写的，特别是涉及我同某些经济学家争论的源源本本，更需要写，但这不是本文集的任务。文集中收集的，只是个人的一点感想的汇集。其中，《共同的心愿》一文写于一九八八年，是为纪念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而撰写的。我提出了“两个北大”的看法。每一个在北京大学学习过和工作过的人，都不会忽略“两个北大”的存在。有人对我说，“两个北大”可能不仅仅存在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也不仅仅存在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内，很可能带有永恒的性质。是不是真的如此？我想，众多的北京大学校友，一定有比我更深的体会。

本文集得以迅速出版，是与《读书》杂志社的帮助不可分的。尤其是沈昌文、贾宝兰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不少的精力，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一九九四年除夕于北京大学

# 目 录

|     |                              |
|-----|------------------------------|
| 1   | 前 言                          |
| 1   | 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                  |
| 23  | 经济学的争鸣与繁荣                    |
| 39  | 文化经济学的探索                     |
| 55  | 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与政府                  |
| 69  | 关于产品文化                       |
| 81  | 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两个<br>问题         |
| 90  | 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                    |
| 104 | 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                    |
| 150 | 社会流动的伦理原则                    |
| 171 | 论中国企业家的忧患意识                  |
| 188 | 现代化研究与人的研究<br>——从贝尔和舒马赫的观点谈起 |

|     |                     |
|-----|---------------------|
| 204 | 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41 | 希克斯的经济史研究           |
| 253 | 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非伦理<br>判断 |
| 261 | 难忘的岁月               |
| 271 | 经济学科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
| 291 | 共同的心愿               |

# 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的体制转入新的体制的变革时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头蓬勃发展。僵化的经济体制已经被冲破,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正如生产力的发展对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也必须对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点、旧学说、旧理论模式进行有力的冲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论点,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不能以经院式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把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公式和个别结论奉为永远不变的教条,并以此来禁锢我们的思想,束缚我们的手脚,这决不是维护马克思

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好心肠的同志,他们想研究新问题,但总想从经典著作中寻找出处,寻找答案,以为只要有了出处,胆子就大了,说话时腰杆子也硬一些,以为这样就给自己找到了护身符,找到了保护伞。比如说,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节,他们就说:《资本论》中讲过政府可以进行宏观调节,宏观调节有这种或那种好处;讲开放资金市场,他们说:《资本论》中已经讲过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他们确实是好心肠的,他们总想给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项措施找到出处。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难道没有出处,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吗?没有出处,我们在研究中就迈不开步子吗?要知道,有出处也好,没有出处也好,我们不去牵强附会,一切以实践为原则。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发展,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断要重新经受实践的检验,当代中国经济学所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性研究的道路。中国经济学界的历史使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创建我们自己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使之对中国的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真正起到指导作用。

在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前景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国情出发。正如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首先是进行国情教育一样,目前经济学的重点也首先是国情研究。国情教育是指对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国情研究也是指对我国社会现阶段的经济特征、经济中的矛盾、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以及经济的变化趋势等进行科学的研究。建国三十年来,也就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明确,总是把发展生产力看得很简单,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事情,从根本上说,就是脱离了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学界才开始从本本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把眼光投向实际,才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九七九年以来经济学界的这一转变的意义不可低估。但即使如此,我们应当看到“左”的积习仍然很深,“左”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那些好心肠的、总想在经典著作中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措施找到出处的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

或者,至少是被“左”的一套吓怕了,从而忘记了对国情的认识、对国情的研究要比引述经典著作中的不符合实际的个别论断重要得不可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国情、研究国情与思想解放是完全一致的。唯有解放思想,才能认识国情,研究国情;也唯有对国情有正确的认识,对国情有科学的研究,思想才能进一步解放。

## 二

对国情的认识和对国情的科学研究,对经济学界来说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很不够。每一个经济学工作者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对待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经济学工作者需要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但他们不能只限于经济政策的研究,尤其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狭隘地理解为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解释。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难道经济理论只是跟在现行经济政策的后面,变为对现行经济政策作解释的学问吗?这不是不仅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而且意味着取消经济理论研究吗?我们常常说,经济理论研究要走在实践的前面。如果经济学工作者只是对现行经济政策作解释,那么理

论研究又怎能走在实践前面呢？

一部经济学说史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如果要作出成绩来，都需要端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他只有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解释，才能在研究中有所突破，才能取得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经济政策产生于经济理论，而绝不能颠倒过来，把经济理论看成是经济政策的附属物。我想，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重要。应当明确：不是让经济政策的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来决定经济学工作者的研究和观点，而是让经济学工作者用自己的新的研究成果来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如此，经济学界除了应当知道经济部门当前正在考虑什么，正在着手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以外，更应当知道经济部门忽略了什么，没有考虑到什么。这就是说，即使以政策研究来说，经济学界应当“想政府之所未想，急政府之所未急”。显然，那些仅仅把解释现行经济政策作为自己的任务的经济学工作者，是不会、甚至不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

由此看来，经济学界面临的任务的确是重大的。他们一要脚踏实地，从国情出发，二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新问题。只有脚踏实地，才能纠正超

越阶段的空想论，才能在研究中既不受经典著作个别论断的束缚，又不受现行经济政策的限制。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总会出现站在时代科学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但不管怎样，能在经济学研究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必定是研究本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人。立足于本国，立足于现实，才能在经济学研究中真正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历史不正是如此么？哪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对本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缺乏研究的人？哪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只会解释本国政府的现行经济政策？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上来。试问，今天谁最了解中国经济？谁最了解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正是我们这些亲自感受过“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人，是亲自体验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究竟是什么滋味的人，是亲自体验到这几年来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人。因此，对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评价，我们最有发言权。就以今天三十多岁的青年经济学工作者来说，他们上过山，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兵，已经懂得什么是饥饿。他们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最动听但又是最无意义的大话、废话、空话、谎话”。他们在着手研究经济

问题的过程中，终于体会到真正阻碍中国经济进步的原来就是那些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被附加上去的貌似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所以说，他们今天在研究中的每一项成就，都来源于他们立足的中国现实生活之中。我有一些学生正在国外留学。我反复叮嘱他们说：你们在国外可以学习很多新知识、新方法，但要记住，如果你们想在经济学方面做出重大的成绩，必须深入到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唯有牢牢扎根在中国经济这块土壤上，才能根深叶茂，结出丰硕的果实。不然的话，你留学回来，可以开一门新课，当一个好教员，你可以讲授某种新的方法，也可以培养一些人。但是你要想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作出成绩的话，那么你必须深入中国的实际，深入社会，了解现实。也就是说，问你：想不想将来走在中国经济学的前沿？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你怎么走在前沿？

### 三

经济学工作者在探讨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有责任对传统的学说提出挑战，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但新观点一开始通常被看成是异端，被当作标

新立异。为此，他们就有可能遭到非难。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经济学说史上看，从来都是如此。一部经济学说史未尝不可以被看成是各种“异端”学说出现的历史，也就是各种新观点替代旧观点或试图替代旧观点的历史。新观点固然一开始被当做异端，但它的真正命运取决于它以后能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异端学说，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匆匆过客，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异端学说就能保存下来，并会逐步从异端变成主流。实际上，经济学中的一切论点，在他们刚被提出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假设。有的假设只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有的假设后来却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假设而没有经过验证，它始终只是一种假设而已。经济学总是在不断地假设和不断地验证之中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会例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也不例外。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为例。新观点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收入分配的要点是，首先看它是不是合法收入，而不是看它是否劳动收入。即使是非劳动收入，但只要是合法的，那就可以存在。但在这样的观点刚出现时，

却被认为是非正统的,从而受到了责难。事实上,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和近年来经济实践的证明,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对于一种社会中的分配制度不能单单地从道德标准去判断,而要从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判断。在目前条件下,允许通过私人资产选择、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取得一定收入,以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不能追求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这是我国的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要发展。这与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矛盾。

也许有人会问,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一种新观点的产生,一种新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究竟归功于谁呢?应当说,经济学创新所依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它们是集体智慧的成果。只有在争鸣的学术环境中,集体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经济学研究中,每一种新的学说的条理化、理论化、规范化,都不是个别人实现的,也不是个别人能够完成的。任何一个研究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敏锐,学识多么丰富,他要作出成绩,总离不开前人在这个